

官僚派系政治與群眾組織的產生 ——以上海柴油機廠為例(1966-1967)

• 王 芳

摘要：文化大革命期間，群眾組織之間出現對立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本文着重探討了文革初期群眾組織分化的根源。通過對上海柴油機廠的實證研究，本文發現：表面上，廠裏的人在前廠長朱文斌是否「叛徒」的問題上產生歧見，並由此分裂為兩個派別組織——「聯司」和「東方紅」；但實際上，文革前廠黨委的分裂及黨委中兩派人物背後的政治力量的較量才是導致「聯司」和「東方紅」出現的直接而根本的原因。換言之，官僚體系內部的派系鬥爭才是群眾組織分化的本源。分析表明，這一結論或許也適用於文革時期其他單位，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關鍵詞：文化大革命 官僚體系 派系政治 群眾組織 上海柴油機廠

一 問題的提出

文化大革命時期，尤其是1966到1967年間，群眾組織之間的「派仗」頻仍。一般而言，「派仗」起初發生在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而隨着運動深入，造反派內部也發生分裂，甚至刀戈相向^①。群眾組織之間為何發生對立，是學界聚訟已久的話題。早期研究中主要有兩種解釋，一種是以李鴻永為代表的「利益團體」模式，另一種則是以魏昂德(Andrew G. Walder)為代表的「政治網絡」模式。

李鴻永在研究文革期間派系分化的論著中指出，學生保守派由出身好的人構成，激進派(即造反派)大都出身不好。前者作為既得利益者傾向於維持現狀，後者則要求改變現有政治秩序；且認為激進派工人的特徵與造反派學生的特徵相似，大體上，合同工、臨時工、非技術工、輔助工、徒工、半工半讀的工人(或學生)以及那些來自小廠(如手工業)的工人構成了激進派工人

* 特別感謝復旦大學歷史系金光耀教授、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黃嶺峻教授以及三位匿名評審人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文責自負。

的主要力量^②。李的研究雖然在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其局限性也頗為明顯，因為從他所使用的統計資料我們亦可得出不同的結論，即「在同一社會階層裏，甚至在同一工廠企業裏，工人也可以完全分裂為不同的兩派」^③。

魏昂德在研究中國工廠權力關係運作的著作中指出，共產黨在工廠創造的垂直政治網絡關係（「依附—庇護關係」）導致了工人的分裂。文革期間，表現為一方是支持企業黨領導的保守派，主要由黨員、積極份子和勞動模範組成；另一方是造反派，包括在過去曾被打擊而心懷不滿的非積極份子、政治上持不同政見者，以及偶爾犯了點政治錯誤或與領導關係不佳而前途無望的人^④。不得不承認，這一理論較具歷史和現實的穿透力，但筆者認為，工廠的領導層並非總是鐵板一塊，且他們之間的矛盾對文革時期群眾的分化可能會產生重要而直接的影響。

此後，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和李遜等人發現：文革期間，上海工人分裂成三派，即造反派、保守派與經濟主義派，他們分別用文化心理（造反的個性）、政治網絡和利益團體等概念解釋這種分裂現象^⑤。還有學者認為保守派和造反派群眾的主要分界線在於他們對幹部的評價^⑥。總的來說，以上研究都着力於從群眾自身的結構性差異來尋找分裂的本源，不足之處在於忽略了外部因素的影響，因而難免失之偏頗。

近年來，魏昂德另闢蹊徑，在關於北京紅衛兵的研究中指出學生分裂與其在文革之前的社會地位和政治網絡無涉，而與工作組的行為以及紅衛兵在工作組入駐學校時期的個人經歷有關。簡言之，派系的形成是由近期的事件（recent short-term processes）所形塑的^⑦。顯然，這種視角不同於以往僅從群眾自身尋找原因，而是同樣重視造成群眾組織分化的外部因素，尤其強調群眾主體與外部環境的互動。既然工作組的角色如此重要，則我們似乎還需進一步追問：是甚麼決定了工作組的行為和立場？深挖的結果很可能會導向文革前的歷史，故而派系的形成就不僅僅與「近期」的事件有關了。

另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官僚派系與群眾組織分化的關係，可惜並沒有深入、系統地探究兩者之間的內在邏輯機制。如王紹光在關於武漢工廠派系鬥爭問題的概述中指出，文革前，武漢的工廠內存在兩個相對抗的集團，一方是黨政幹部與積極份子的聯盟，一方是專業幹部與落後份子的聯盟。文革爆發時，這種聯合便在社會上公開出現。但他沒有明確指出黨政幹部與專業幹部的分化是否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工廠內不同派系群眾組織的產生，而是籠統地認為十年文革發生的派性鬥爭，是植根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已經存在着的社會分歧。總的來說，王紹光還是傾向於從群眾自身的結構特徵來解釋他們為何選擇了不同派系的組織^⑧。

董國強與魏昂德通過對南京師範附屬中學、南京大學以及南京長江機器製造廠幾個案例的剖析，挑戰了「利益團體」模式中強調的群體團結，認為來自北京的含義模糊的政治號召，使得那些在現有政治體制下具有共同立場的人們難以在變幻莫測、高風險的境況下作出相似的政治抉擇^⑨。雖然選取同一城市中幾個不同類型的單位，可以觀察到群眾組織派系成因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但他們試圖通過總結這些多樣性之中的共同特徵，從而得出一個與「利益團體」模式不同解釋的做法，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對獨立個案的深入探

討，而事實上這種深入探討很可能帶來對群眾組織派系問題的新認知。譬如，他們發現：南京長江機器製造廠受中央第四機械工業部與南京市委的雙重領導——生產業務歸前者領導，黨組織關係則隸屬於後者。這兩級領導在「四清運動」期間的矛盾使得文革前該廠的幹部、工人內部即已發生分裂，並成為文革時該廠出現兩派對立群眾組織的重要誘因^⑩。問題在於，這兩級領導的矛盾只是從四清運動才開始的嗎？與王紹光的研究類似，他們對這一案例的觀察，並沒有明確指出官僚的分化是否文革期間群眾分化的本源，而是結合其他兩個案例，得出了一個僅止於與「利益團體」模式對話的結論。

此外，另一些研究還注意到毛澤東、中央文革，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的派性衝突等外部因素對群眾組織關係的影響^⑪。這些成果視角新穎，給人啟發。不過，這些研究多數沒有系統地闡明這些外部環境是群眾組織分化的本源，抑或是分化持續的動力。

有鑒於此，筆者擬以文革時期的上海柴油機廠（以下簡稱上柴廠）為例，並利用官方檔案、年鑒、日記、憶述資料、揭發材料、對立兩派群眾組織的出版物（如小報、傳單）等相互對照，進一步探討文革中群眾組織打「派仗」的深層原因。上柴廠是一個軍工廠，文革期間該廠群眾組織分裂為兩派，並引發了全市性的派系分裂，乃至於1967年8月4日爆發了上海文革史上最大的一次武鬥^⑫。因而，該廠在上海文革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文革初期，該廠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複雜而尖銳，牽涉到從廠黨委直至中央等多級官僚機構，這無疑為我們了解文革期間的派系分裂提供了絕佳的窗口。本文希望通過對上柴廠個案的分析，加深對文革時期群眾運動的理解。

二 「聯司」與「東方紅」產生的背景：官方幕後勢力的較量

文革前，上柴廠約有六千職工^⑬，1962年歸農業機械部（1965年更名為「第八機械工業部」，以下簡稱八機部）直屬^⑭。文革初，上柴廠與全國絕大多數工廠或單位一樣，受到了如火如荼的運動影響。表面上，廠裏的人在前廠長朱文斌是否「叛徒」的問題上產生了歧見，並由此分裂為兩個派別組織——「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以下簡稱「聯司」）和「上海柴油機廠革命群眾東方紅戰鬥總部」（以下簡稱「東方紅」）；實際上，這兩派產生的成因遠非那麼簡單，他們的背後均有官方勢力的支撐。這兩股官方勢力如何形成？對文革時期上柴廠群眾組織的派系形成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因牽涉的人物較多，筆者擬以朱文斌為核心展開敘述。

（一）第一層幕後人物的較量：上柴廠領導層的內部矛盾

建國前，朱文斌曾在江南太倉、蘇州、常州等地從事地下黨工作^⑮。1941及1946年曾有兩次「脫黨」經歷——1956年「審查幹部」（以下簡稱「審幹」）時，被官方作「脫黨」（而非「叛徒」）處理^⑯。1958年他因「歷史情況」，由上柴廠黨委副書記一職調任行政工作，改由從部隊轉業而來的王永安^⑰接任上柴廠

黨委副書記^⑩。這裏所謂的「歷史情況」，指的應是他那兩次「脫黨」經歷。此後，朱文斌就任上柴廠廠長，在廠黨委的班子裏由「副書記」降為「委員」。

1960年代初，上柴廠的黨政系統補充了一些新的外來幹部。值得注意的有兩個方面：其一，1963年，原第三機械工業部國營長春機械廠黨委書記韋錫琢^⑪由農機部調任上柴廠黨委書記（此前這個職位一直處於空缺狀態）；其二，1964和1965年，一些從部隊轉業的軍人被安排到上柴廠任職^⑫。其中，1964年約有七十人，大多是營、團級以上的海軍幹部。在人事安排上，他們因缺乏生產技能，故被分配到各大車間、部門做總支書記，乃至逐漸形成地方幹部管生產、行政，部隊幹部管政治的局面。由於來源、經歷以及工作性質等差異，黨政系統與行政、生產系統的幹部間出現了隔閡與矛盾^⑬。

這些矛盾中，最不能忽略的就是權力之爭。有材料揭批，朱文斌在上柴廠掌權的十幾年時間內，在從中央到市委的「庇護」下，將全廠技術、生產、經濟、計劃、財務、檢查等各方大權都控制在自己的親信手中，竭力推行「一長制」、「專家治廠」、「生產第一」等「修正主義貨色」，「操縱」了上柴廠的命脈^⑭。這個說法應具一定的真實性，理由有二：

第一，所謂「庇護」說應不是空穴來風，這一點我們似可從四清運動時上海市委、八機部等對朱文斌的處理窺測一二。1965年5月至1966年5月，上柴廠開展四清運動。「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揭開了廠黨委的「階級鬥爭蓋子」，其中朱文斌的「叛徒」問題成為他被攻擊的重點。不過，上海市委、八機部對於朱的「四清結論」仍舊只作「脫黨」處理^⑮。這個四清工作隊乃由八機部副部長李濟寰^⑯領銜，上海市委監委副書記許萌等人組成^⑰。然而，運動尚未結束，朱文斌便於1966年4月被八機部調至貴陽從事三線建設，任貴州柴油機廠廠長^⑱。文革初上柴廠的四清工作隊被指「包庇」朱文斌「過關」，且「保」他到內地擔任要職^⑲。如果這種指責不足為信，那麼當朱文斌因「叛徒」問題受到攻擊時，從八機部到上海市委仍堅決維持「四清結論」和維護他^⑳，似可讓我們進一步感知官方與朱文斌之間的關係——可以推測，這種「關係」對朱文斌及上柴廠的權力結構是有重大影響的。

第二，在1950至1960年代，國家在工廠裏推行的一些政策也有助於朱文斌掌控上柴廠的一部分權力。譬如，對於國營工業企業，中央於1953年曾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一長制」，儘管1956年重新選擇黨委領導制，但在1961年又突出了廠長的作用，並在〈中央關於討論和試行《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的指示〉中強調，企業黨委要好好地領導和支持以廠長為首、全廠統一的生產行政指揮系統行使職權^㉑。在這段時期，朱文斌先後擔任上柴廠黨委副書記和廠長，可謂手握大權。在這種條件下，他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影響在上柴廠形成自己的勢力和吸納追隨者似乎是可以想像和理解的。當然，由於國家在1949年後到文革前的十幾年中，在黨委領導制和廠長負責制上搖擺不定，也很可能滋生或助長了工廠領導層內部的矛盾。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文革前上柴廠的領導層實際上已經出現了分化。大體上，屹立於矛盾兩端的分別是以王永安為代表的黨政系統幹部和以朱文斌為首的行政、生產系統幹部。有資料表明，文革前韋錫琢、王永安、朱文斌等在上柴廠各自培植「私人勢力」。其中王永安通過重用一批人控制了各大總

支的黨權，而朱文斌則在「工業七十條」的「廠長負責制」的名義下，掌控着全廠的生產大權^②。實際上，這兩個系統之間的「嫌隙」在四清運動時便已凸顯。其時，朱文斌的「叛徒」問題被掀上「檯面」，但一直拖延至運動後期，「經廣大群眾的堅決鬥爭」，官方才被迫成立了專案組。李濟寰、許萌為專案組「定框框」，表示只准在1956年的「審幹」結論範圍內核實、調查朱文斌的問題，且只打算在四清工作隊隊委、廠黨委擴大會議上對朱進行批判，這遭到了1964年轉業來上柴廠的中層幹部的激烈反對^③，兩者之間的矛盾可見一斑。這種關係結構深深地影響了文革之初上柴廠運動的格局和走向。

1966年6月文革前夕，上柴廠高層的權力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動。其中，朱文斌被調離廠，廠黨委書記韋錫琢調至八機部中國拖拉機內燃機公司華東公司（以下簡稱華東公司）工作。隨後，原上柴廠政治部主任馮成章出任廠黨委副書記（仍兼政治部主任），原上海市手工業局黨委副書記兼政治部主任劉東海調任上柴廠黨委書記，王永安仍任上柴廠黨委副書記一職^④。不過，在韋錫琢調離後，劉東海因憚於上柴廠情況之複雜，遲遲沒有就職，直到6月23日才上任^⑤。在劉東海還沒有到來前，王永安、馮成章等人相當於上柴廠裏的最高領導者。馮成章是1964年那批轉業幹部中的一員（轉業前是中校軍銜），轉業後任上柴廠政治部副主任，1965年6月升為政治部主任^⑥。他與王永安同處一「壕」，都是「反朱派」^⑦。

文革初的上柴廠，先是有一批所謂寫「反動」標語（署名「KO行動小組」）的人受到了廠黨委的壓制，不久廠中就有「群眾」貼出大字報質問廠黨委，稱文革不能僅僅局限於破獲反動傳單問題^⑧。自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及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以來，所謂的「當權派」成為運動的矛頭所指。眼見「革命」之火已經燒到自己的身上，上柴廠的黨委該如何應對呢？

6月10日，上柴廠教科尹長耕、童隆順貼出了題為〈朱文斌到甚麼地方去了？〉的大字報，揭發朱文斌兩次「脫黨」的歷史問題，全廠轟動^⑨。儘管6月1日之後，一些廠領導如王永安等都受到了大字報的攻擊，但以對朱文斌的揭發最為突出^⑩。有資料顯示，廠黨委中的一些人稱：「搞朱文斌叛徒問題是上柴廠運動的大方向！」、「搞朱文斌叛徒問題，是關鍵的關鍵！」王永安甚至說道：「朱文斌不是叛徒，中央就是提倡修正主義！」、「朱文斌不是叛徒，毛主席著作就要修改了！」^⑪朱當時已不在上柴廠任職，卻成為主要攻擊對象，似有蹊蹺。半年後，該廠的一個名叫「井岡山」戰鬥隊的群眾組織撰文，認為這是因為王永安等廠黨委為了保自己過關，故意借尹長耕等人之口拋出朱，通過打「死老虎」來實現自己「金蟬脫殼」的「詭計」。文章還分析稱：「如果搞朱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問題，會牽連到自己，搞朱的歷史問題，把朱定為『叛徒』，則其他問題會『迎刃而解』。這樣，王永安等人不但可以逃避罪責，反而能夠得到一個『有功之臣』的美名，一舉兩得。」^⑫筆者認為這個分析是比較符合邏輯的。

不過，為甚麼單單選擇朱文斌而不是其他人呢？這篇文章披露了這樣一個細節，即朱文斌與王永安是「冤家對頭」，認為現在「王」家當權，所以要整朱文斌^⑬。既然是「冤家對頭」，足見兩人「宿怨」已久。與王永安一同反對朱

文斌的還有前述一大批從部隊轉業來上柴廠的幹部，這可能與他們有着共同的身份（轉業軍人）有關。值得注意的是，「反朱派」還「積極地投入了揪朱文斌黑線——『四大金剛八大羅漢』的激烈鬥爭中」^②，所謂的「四大金剛八大羅漢」，應指上柴廠生產、技術等領域中與朱文斌關係親近的領導者^③。這似乎更坐實了筆者對上柴廠的領導層存在權力鬥爭的推測（這種矛盾在文革初更赤裸裸地暴露出來）。圍繞着朱文斌是否「叛徒」的問題，廠領導層發生分裂，形成兩派^④。

（二）幕後的幕後：四級黨委與韋錫琢等人之間的恩怨糾葛

隨着事態的發展，朱文斌是否「叛徒」的問題，驚動了八機部、華東局、上海市委、第一機電工業局（以下簡稱機電一局），且這四級黨委都是表態支持「四清結論」（即朱文斌不是「叛徒」）的；其中身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工業的馬天水^⑤是個關鍵人物。針對四級黨委的反應，「反朱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並將矛頭同時指向了馬天水、李濟寰等人。

前述尹長耕、童隆順於6月10日貼出的那張大字報，除揭發朱文斌的「脫黨」問題外，還批評了以李濟寰、許萌為首的四清工作隊在朱文斌問題上採取了「包庇」態度^⑥。緊接着，馬天水通過機電一局、上海市委有關幹部間接向上柴廠傳達了自己對朱文斌問題的態度，即「朱文斌是黨內問題不要揭」；並向劉東海施壓，希望他能立即到上柴廠工作，設法「扭轉運動方向」。但是，上柴廠要求重新審查朱文斌「四清結論」的呼聲仍不絕於耳。6月中下旬，馮成章還致信毛澤東，揭發文革中有人指責揭發朱文斌是「方向不對頭」，保朱過關。7月3日，王永安又向中共中央、華東局寫了一份報告，揭發李濟寰的「錯誤言行」和「包庇」朱文斌的問題^⑦。

8月初，馬天水致電中央工業交通政治部，請求派人來滬出面處理。中央工交政治部乃派辦公室副主任王屏赴滬。王抵滬後，馬以部長級待遇加以招待，馬本人也親自與王會見幾次。1967年初，原上海市委工業政治部聯絡員董煥章揭露「這樣的待遇恐怕是破例的」。此後，馬、王二人就朱文斌問題統一口徑。王回去後向中央工交政治部匯報「同意市委原結論」，且還給劉東海寫了一封信「進行工作」^⑧，內容很可能包括向劉表明自己對朱文斌問題的態度。

這一時期，王永安、馮成章寫給中央的信和報告，中央閱後乃批示由華東局處理。8月13日，王屏率華東局及上海市委方面的有關幹部來上柴廠參加黨委擴大會議，在會上提了關於朱文斌的四個「不是」的論點，即朱「不是叛徒；不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是包庇反革命；不是定時炸彈」，隨即引起「反朱派」的不滿。8月16日，上柴廠黨委針鋒相對地公布了幾項決議，表示黨委一致認為朱文斌是叛徒，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李濟寰是保皇派等。8月底，廠黨委擴大會議繼續進行，「革命幹部、革命群眾」抓住所謂市委「最心虛的關鍵」，即朱文斌的「叛徒」問題，繼續揭發、批判，狠打猛衝^⑨。

從上面的敘述來看，馬天水在朱文斌問題引發的一系列事件中是個關鍵人物，四級黨委的態度也很明顯，即一再強調朱文斌不是叛徒。與之觀點相

左的，除了上柴廠領導層中的王永安、馮成章等人外，還有華東公司經理陳明達^⑩（在上柴廠蹲點的「創大慶」工作組組長，文革初實為該廠文革工作組組長）。

9月5日，上柴廠黨委召開部分黨員工組長以上幹部會議，出席者基本上是「反朱派」。陳明達在會上作了動員，提出要「上打『保皇派』，下打『爪牙』」^⑪，針對性很明顯。

接下來召開的「紅色革命指揮部」（「東方紅」的前身）籌備會議，使得兩派對立的情形愈加明顯。9月14日，「反朱派」召開「紅色革命指揮部」籌備會議，提出了明確的口號：「圍城打援，鬥朱文斌，打三家村（馬天水，李濟寰，陳守芬）。」與會者大部分就是1960年代中期來到上柴廠的轉業幹部^⑫，還包括王家成（政治部副主任兼組織部部長）、馬喜龍、孟慶禮（監委副書記）、施志清（幹部部部長）、楊祖熙等五個廠黨委委員以及邢子華、周道樹等總支書記及直屬支部書記。資料還顯示，韋錫琢也參與了反朱活動，並與「紅色革命指揮部」有關聯^⑬。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馬、李、陳究竟為甚麼被打成「三家村」呢？第二，作為上柴廠前黨委書記，韋錫琢究竟扮演了甚麼角色？

對於前一個問題，「反朱派」主要攻擊他們「包庇」朱文斌。那麼，他們究竟與朱的問題有甚麼關聯？或者說，「反朱派」是如何將他們與朱文斌聯繫起來的？首先是陳守芬，1956年「審幹」時他是上柴廠肅反組長，朱文斌是副組長^⑭，陳與朱1956年的「結論」勢必難脫干係，故而「反朱派」攻擊他當年「包庇」朱過關^⑮。至於馬天水，則被認為在「審幹」和四清運動中都包庇了朱，是朱的「後台」老闆。而李濟寰亦被認為是另一個「後台」^⑯，因為他當時是上柴廠四清工作隊隊長。

其實，陳守芬、馬天水、李濟寰三人之間的關係本來就非比尋常。他們均為河北人，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為同僚。1944年9月到1945年8月，李與陳同在中共冀晉區第三地方委員會任職，李為副書記、委員，兼任城工部長和統戰部長，陳任社會部長。同一時期，馬則在冀晉區第五分區工作，擔任過地方委員會書記及第五軍分區政治委員^⑰。1949年，馬、陳均隨軍南下，在皖南區共事^⑱。後來兩人又都來到上海主理經濟工作，馬分管上海市工業，陳擔任過上柴廠黨委副書記、書記兼廠長^⑲；李雖上調北京，但先後在農機部和八機部任職，也屬經濟部門。可以想見，這三人僅以工作性質論也有頗多交集。

而本文的主角朱文斌與三人之間的關係又如何呢？建國初期，陳守芬與朱是同事。有資料表明，陳不同意「朱文斌是叛徒」的說法，且這個態度還影響了他的女兒陳憲珍（上柴廠某車間黨總支組織幹事，後來成為「保朱派」的骨幹份子）^⑳。馬天水與朱首先是上下級關係。馬生活簡樸，工作勤勉，經常深入工廠第一線，對上海工業生產情況很熟悉^㉑。朱也是實幹派，馬對朱頗為欣賞，認為他為人精明能幹，有管理企業的能力^㉒。另外，了解內情者還揭發朱是馬的「親信」^㉓。因此，馬對朱予以「保護」便不難理解了。在朱文斌歷史問題上，馬的態度堅決，認定朱不是叛徒。他還認為，「朱文斌是叛徒的話，那麼上海就有不少的叛徒了」^㉔。李濟寰、許萌等率四清工作隊來上柴廠，在給朱文斌下結論前，於公於私，應該都不會繞開馬天水與陳守芬。也確有資料稱，四清運動中在給朱文斌的問題定性之前，李曾幾次拜會馬、陳二人^㉕。

可以想見的是，如果朱文斌「不是叛徒」的結論一旦被推翻，陳守芬、馬天水、李濟寰三人都將被「殃及」。且僅從馬天水來看，他在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前，曾任國民黨唐縣第七區分部委員。這一段歷史如果被知情的「好事者」演繹，馬恐怕將同朱一樣受到打擊。也因此，董煥章在一份揭發材料中指出，馬花這麼大的精力包庇朱，絕不僅僅是為了朱，而是因為朱與陳都是他的親信。他包庇朱、陳、李三人，歸根結底是為了保護自己^⑥。

不過，文革中「反朱派」之所以要攻擊陳守芬、馬天水、李濟寰三人——雖然表面上稱他們「包庇」了朱文斌，但實質上此事還另有緣由。在這裏就需要提及一個關鍵性的幕後人物——韋錫琢。文革前夕，韋儘管被調離上柴廠，但其影響力仍然存在，是反朱的「東方紅」一派的幕後力量。據保朱的「聯司」一派的一份揭發材料表明，韋曾給王永安去電，提出關於朱文斌的綜合材料有問題，原本稱朱為「政治投機份子」，韋提議改為「叛黨投敵份子」。韋且指示廠黨委，令廠級文革小組將朱的綜合材料發到每個基層小組討論，並指派中層幹部和黨委聯絡員參加各基層小組亮相、劃框框、定調子等，與他們觀點不同者就要「遭到他們的豎眉毛、彈眼睛、大聲叱責，直到以後記名單列為教育、批判、鬥爭對象」^⑦。韋與廠裏領導層中那些「反朱派」也大有關係。王永安、馮成章是其「心腹」；前文提到的施志清乃其愛人；楊祖熙是韋從長春帶至上柴廠，後來從廣播站站長提升為總支書記，可見關係密切。其他人如王家成、馬喜龍、周道樹等也是緊隨韋錫琢^⑧。韋與廠外的陳明達也頗有淵源，國共內戰時期，兩人曾在山東戰場一起工作^⑨。1965年5月，陳在濟南書記處書記的任上赴上海任華東公司經理，韋離開上柴廠後即在這個公司出任黨委書記。

韋錫琢的「幕後」身份於1966年9月20日被繼任上柴廠黨委書記的劉東海公開揭發。前述「紅色革命指揮部」召開籌備會議後，又於9月15日召開成立大會，參加者一千五百人左右。當時認為朱文斌不是叛徒的「群眾」被排斥在會場之外；下午大會結束時，這些人包圍了廠黨委。兩派人遂在廠黨委門口對峙，爭吵激烈^⑩。9月20日，劉東海在全廠職工大會上帶着批評的口吻專門講述了這次大會的有關情況^⑪：

下午開了全廠大會。晚上我越想問題越嚴重，越弄越複雜，越了解問題越多，怎麼辦？晚上就開了常委會研究這個問題。後來了解到，還有前任黨委書記韋錫琢參與活動，他是我的頂頭上司也來插手，問題越搞越複雜，好傢伙！原來我只知道是王家成、邢子華、周道樹，現在又出了個韋錫琢，感到問題不好辦，人家水平比我高，感到問題不簡單。

事實上，9月15日後，劉東海曾專門召開會議找韋錫琢了解究竟，由王永安主持。韋談了兩件事，即9月13日早上，周道樹、馬喜龍向韋反映「廠裏運動有點右」；15日晚上，孟慶禮、王家成等到韋的家中，表示對廠裏運動不滿意，抱怨兩個多月還沒有定下朱文斌是叛徒。劉東海進一步披露，邢子華在15日後曾叮囑「紅色革命指揮部」的負責人侯彩琴：「只能說三個人，只能講周道樹、馬喜龍、和我邢子華，特別韋書記不能講。」^⑫由此可見，韋錫琢確實

與「反朱派」關係緊密且對他們的活動頗為了解，毋寧說「反朱派」是在向韋匯報和反映反朱活動的進展。簡言之，韋錫琢實為「反朱派」的幕後人物^⑳。

不過，對於韋錫琢等「反朱派」而言，他們的主要目標可能不僅僅是朱文斌，還有馬天水、李濟寰等人。前文提及，李濟寰、許萌等幾乎與朱文斌同時受到了大字報的攻擊。上柴廠中對於四清工作隊有意見的大字報，主要還是針對李濟寰，並要求「轉中央、毛主席、監委」^㉑。李之所以受此「待遇」，可能與一些歷史恩怨有關。已有研究表明，上柴廠領導層中有人對八機部有意見^㉒。10月9日，為解決上柴廠的問題，應馬天水的要求，八機部部長陳正人派副部長徐斌州來上海。徐參加了上海市委書記處專門就上柴廠運動召開的會議，徐在會上說：「他們的目標不是搞馬天水、李濟寰，而是要反八機部、反市委、反陳丕顯和陳正人！」且提到這些人「早就反黨」^㉓。這樣的發言是頗有深意的，似乎正點出了上柴廠一些轉業幹部與八機部的歷史糾葛。當然，並不能說每一個從八機部轉業到上柴廠的人都對八機部不滿，但只要幾個一起「造反」，那種能量也是不能忽視的。文革的發生為他們發洩對八機部的不滿提供了一個出口，李濟寰身為八機部副部長被當作「靶子」便不難理解。

至於馬天水為何受到攻擊，也與一些舊恩怨有關。有資料顯示，文革前他與韋錫琢之間鬧過不愉快。韋曾將誠孚動力機廠、分興動力機廠、上海汽車配件廠、第一汽車附件廠、上海拖拉機廠等幾十家上海農機公司、電器公司的廠都劃給「托拉斯」^㉔，且欲將上柴廠分成五個分廠，組成一個小「托拉斯」，但他不願將這個小「托拉斯」的黨委組織關係和上海市委管工業的馬天水等掛鉤，而欲與華東局掛鉤。後來這個計劃遭到馬等人的堅決反對，沒有全部實現。由此，韋對馬等人頗為不滿^㉕。另一則材料反映，1966年7月，當馬得知上柴廠有人向華東局、中共中央寫信狀告他「包庇」朱文斌時，他對此「非常抵觸」、「惱火」，認為上柴廠黨委中的一些人揪朱的「叛徒」問題，除了是從成見出發、鬧宗派矛盾外，還和他「過不去」。他想到了自己與上柴廠黨委過去「有隔閡」，「一度曾想把黨委中對我意見最大最多的人找來談一談，把過去的問題和朱文斌的問題徹底攤開，求得解決」^㉖。我們尚無法確知馬所指的「意見最大最多的人」是否指韋錫琢，不過，這兩則材料都說明：文革前馬與上柴廠領導層中的一些人明顯是有矛盾的。

綜上所述，朱文斌的「叛徒」問題之所以在上柴廠內外沸沸揚揚，不僅關乎一些幕後人物的現實利益和人情關係，還與一些歷史恩怨有關，故而存在這樣一種說法：「上海有幾千家工廠，沒有一家工廠象〔像〕上柴廠這樣得到身為市委書記的馬天水如此關懷，親自干預；也沒有哪家工廠象〔像〕上柴廠這樣驚動了從華東局書記、中央工交政治部、八機部、市委到機電一局，那麼多的高級幹部直接到廠插手。」^㉗這種說法可能略顯誇張，不過也表明了上柴廠文革運動的複雜情況。

三 官方派系政治與「東方紅」和「聯司」的形成

文革初期，上柴廠最先出現的兩個對立組織，一個是「紅色革命指揮部」，一個是「文化大革命群眾串聯總站」（以下簡稱「串聯站」）。前者堅持認

為朱文斌是叛徒，後者與之相反。事實上，這兩個組織其實都是在官方的支持下成立的。

「紅色革命指揮部」於1966年9月14日籌備，15日正式成立，並制訂了綱領、宣言、行動步驟等。其有兩套班子：公開的班子基本上都是廠裏的普通職工，由侯彩琴任總指揮；幕後的班子均為前文提到的上柴廠領導層中的「反朱派」，其中王家成、邢子華、馬喜龍任幕後總指揮，韋錫琢的愛人施志清擔任「鋤奸」^①的負責人。毋庸贅言，「紅色革命指揮部」表面上是一個群眾組織，實際上是一個由上柴廠領導層中的一些人幕後操縱或指揮的組織，更何況它還得到韋錫琢的支持。

「紅色革命指揮部」乍成立便於9月17日更名為「紅衛兵指揮部」，意即「領導全廠紅衛兵」^②。名義上它是一個純粹的紅衛兵組織，實際上仍由廠黨委中那些「反朱派」操縱。廠黨委派一副廠長及黨委前組織部副部長直接參與了這個組織的活動^③，甚至還發了通知任命全部組織成員，另派黨委副書記馮成章任該組織的政委。10月31日，「紅衛兵指揮部」召開「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聲討大會」，成立「東方紅」。「東方紅」也是在上柴廠那些「反朱派」領導人的插手下成立的，其總部的五個成員都是總支「信得過」的，分部的候選人名單也是由總支點名^④。

而「保朱派」組織「串聯站」的情況又如何呢？其最為重要的發起人之一是陳憲珍。面對「反朱派」在「朱文斌是叛徒」言論上的步步緊逼，9月10日，「保朱派」掀起派代表去北京告狀的簽名運動。12日，劉東海召集「保朱派」代表，商討選派人員赴京問題，最後確定由陳憲珍等五人赴京。在陳等赴京前，馬天水還派人接見他們，要其赴京以控告廠黨委為主，不要以保朱的面目出現。當「紅色革命指揮部」召開籌備會議時，陳等五人動身赴京^⑤。同時，馬天水去電八機部請他們予以接見^⑥。

到京當日，八機部領導陳正人等便與陳憲珍等人連續談了三個多小時，表示支持後者的「革命」行動，令他們很受鼓舞。其他方面，如中央工交政治部辦公室副主任王屏、檢察院也對他們給予了支持。9月26日，陳等一行人返滬後即向市委聯絡員（轉馬天水）和機電一局派出的駐上柴廠調查組匯報了赴京情況^⑦。10月2日，兩個「方面」均表示支持陳成立組織。10月4日，「串聯站」正式成立（「串聯站」的名稱正是調查組起的^⑧），由董煥章等人負責具體聯繫工作^⑨。由此可見，「串聯站」也是一個有着官方背景的組織，它得到了四級黨委的支持。

除「串聯站」外，「保朱派」還相繼成立了一些其他組織。10月8日，「紅衛兵先鋒大隊」在上柴廠文化宮正式成立，初約四十人；屬於「保朱派」的上柴廠團委書記王鈞培出席了他們的大會並作了講話^⑩。隨着運動的發展，「串聯站」內部出現了分化，陳憲珍、王鈞培乃請示華東局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黃宇齊研究整頓組織，並於11月20日成立「文革串聯總站糾察大隊」（後更名為「紅色造反團」）。這個組織的宣言和綱領由王鈞培起草，是一支約千人的機動「戰鬥力量」；其他諸如「上柴工人赤衛隊」、「向陽造反隊」等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⑪。1967年1月10日，「串聯站」與其他一些「保朱派」組織，聯合成立了「聯司」，並宣布接管上柴廠^⑫。2月24日，部分支持「聯司」的幹部開會，當場共有四十五名幹部貼大字報支持「聯司」^⑬，亦可從側面反映「聯司」的「後台」力量。

綜上所述，「東方紅」是一個受「反朱派」領導層控制和指揮的組織；而「聯司」的骨幹成員則來自「保朱派」組織「申聯站」，其他的一些構成組織也與官方有關聯，因而可以說「聯司」也是一個「官方」組織。

四 結論

從本文的論述可見，其實不管是「東方紅」還是「聯司」，儘管習慣性地被稱為「群眾組織」，然而它們的自發性是很值得懷疑的。「東方紅」和「聯司」都是有官方背景的組織。廠黨委的分裂以及黨委中兩派人物背後的政治力量的較量，由上而下或錯綜複雜地影響了一個單位的政治環境，而這種分裂的存在又是與文革前甚至是1949年前的歷史息息相關的。換言之，官僚體系的派系鬥爭很大程度上直接導致了上柴廠兩派群眾組織的產生，也即它們分化的本源。

那麼，上柴廠的例子是否具有普遍意義？筆者認為，前述王紹光對武漢工廠的研究以及董國強、魏昂德關於南京長江機器製造廠的論述至少可以證實，文革前一些工廠的領導層是存在分歧的。上海、武漢、南京的現象共同表明：在一些工廠內，文革前出現了兩個相互對立的權力結構——確切地說是黨政系統與行政、生產系統的對立，二者之間的矛盾對文革初廠內群眾組織的派系鬥爭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以上情況在全國其他一些地方出現也是可以想見的。因為在1966年，當許多單位出現所謂的「少數派」（即後來的造反派）和「多數派」（即後來的保守派）時，單位裏原有的權力體系並沒有徹底崩潰，也即魏昂德在關於北京紅衛兵的研究中所否定的「政治網絡」模式其實尚在發揮作用。不同的是，有些單位的官員（或與這些單位關係緊密的官員）可能並非鐵板一塊。隨着運動的深入發展，在與中央和基層不斷的互動中，這些官員通過直接策劃或間接扶植各自的「群眾組織」而獲取「支持者」。在這種情況下所產生的群眾組織，將天然地帶有派系色彩。由此可見，上柴廠的例子並非個別案例，更可能是具有一定普遍意義的。

雖然官方的影響如此重要，但並不意味着群眾就是官員的木偶，他們也有各自的訴求。如加入「聯司」的大部分成員在文革初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迫害，被廠黨委打成「右派」、「牛鬼蛇神」等，甚至受到經濟上的制裁（如停發獎金）^④。這種打擊是嚴重的，不僅使其自身利益受損，還將牽連家人。一位「聯司」派負責人曾這樣鼓動「聯司」成員^⑤：

同志們，你們是右派，是反革命，要是東方紅勝利了，這些幹部還要騎在你們頭上，你們就會是右派！……我們哪裏有出頭的日子啊！他們掌權了，我們就要吃第二遍苦頭了！老師傅們！你們現在年過半百，只受半輩子的苦，可是你們的兒子，孫子，將要永遠背上「右派」「反革命」子女的包袱呀！同志們！我們無論如何也要奪權……

表面上看，這份資料顯示群眾是處於被動「動員」的狀態，但實際上群眾之所以能被「動員」，主要與其切身利益有關。而保護自身利益的最佳途徑就是參

與或支持組織的奪權鬥爭，使之獲得絕對的話語權。當官員在明爭暗鬥時，「聯司」和「東方紅」兩個組織則熱衷於奪取廠裏的實權^⑥。兩派群眾組織的奪權行為，正是文革時期存在於絕大多數單位的一種普遍現象。這種基於各自利益的爭鬥，往往是群眾組織持續分化（或重組）的重要動力之一。這將是另一個需要專門探討的話題。

註釋

①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頁86。

② 參見Hong Yung Lee,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4 (December 1975): 645-83;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340.

③ 林偉然著，李玉華譯：《一場夭折的中國文化啟蒙運動——階級鬥爭理論和文化大革命》（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出版年份不詳），頁9。

④ 魏昂德（Andrew G. Walder）著，龔小夏譯：《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結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頁274。

⑤ 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189-96.

⑥ 參見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國內的一些研究者也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如唐少杰分析了清華大學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對立表現，認為兩派在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如何評價文革前十年以及如何對待幹部隊伍上都出現了分歧。但唐指出造成這類分歧的本質原因可以從文革前和文革時的群眾利益來把握。基本上，他的觀點與李鴻永相似。參見唐少杰：〈從清華大學兩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眾組織的對立和分歧〉，《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頁68-74。

⑦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50-62.

⑧ 參見王紹光著，王紅續主譯：《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48-49、23。

⑨⑩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lict in Nanjing”, *The China Journal*, no. 65 (January 2011): 1-25; 18, 24-25.

⑪ 參見唐少杰：〈從清華大學兩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眾組織的對立和分歧〉，頁68-74；〈毛澤東與清華大學的文化大革命〉，《粵海風》，2001年第6期，頁21-25；卜偉華：〈「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點〉，《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3期，頁69-73；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頁85-95；董國強：〈社會史視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2期，頁65-74。

⑫⑬ 參見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第二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頁856-912；857。

⑭ 上柴東方紅戰鬥總部等編：《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1967年4月），頁26。文中所引用的一手資料，如無特別說明，基本上源自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所藏，下引不再另註。

⑮ 〈農機部黨組關於上海柴油機廠歸部直屬的請示〉（1962年6月12日），上海市檔案館，A38-1-298，頁64。

⑯⑰⑱⑲ 上柴東方紅「勇往直前」戰鬥組：〈從上柴廠文化大革命的發展看東方紅鬥爭的大方向〉，載上海柴油機廠東方紅總部宣傳組編，工總司機電一局聯絡總站翻印：《革命何罪》（1967年6月首印，翻印日期不詳），頁2；2；3；4。

⑳㉑㉒㉓ 東方紅革命委員會「送瘟神」戰鬥組：〈上柴串聯站是甚麼樣的組織？〉，載上海柴油機廠東方紅革命委員會「山花爛漫」戰鬥組編：《評上海柴油機廠聯司（串聯站）的大方向》（1967年3月），頁1；2；3；3。

⑰ 王永安(1921-?)，十五歲讀私塾那年，其父「因封建勢力壓迫」而早逝，王從此種田務農。1941年參加新四軍，後回地方工作，1946年參加人民解放軍。參見王永安：〈永遠跟着黨前進——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七十五周年〉，載《燈塔頌——上海市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歷史研究會慶祝中國共產黨誕辰七十五周年論文專輯》(1996年6月)，頁91。

⑱ 〈中共上海市委工業工作部關於幹部任免與各單位來往文書及批覆(二)〉(1958年)，上海市檔案館，A36-1-144，頁54。

⑲ 韋錫琢(1921-1995)，江蘇洪澤人。貧農出身，學徒成份，初中文化。1940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參加工作。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時期，曾任淮寶縣工會主任、華中總工會常委兼組織部長、華東軍區野戰四縱隊後勤處副處長等。1949至1954年，任蘇北總工會籌備會主任，正、副主席及勞動局長等。1954至1959年，任一機部第一汽車製造廠工會主席、廠黨委常委等。1959至1963年，任三機部長春機械廠黨委書記。1981年，任上海房地產管理局局長。參見〈農業機械部幹部司關於韋錫琢同志擔任上海柴油機廠黨委書記的函〉(1963年)，上海市檔案館，A36-2-630，頁31-32；《上海房地產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房地產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頁450。

⑳㉑㉒㉓ 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紅心永向毛主席戰鬥隊：〈從聯司的產生發展和所作所為看它到底是甚麼貨色——上柴階級鬥爭調查報告之二〉，《東方紅》(同濟大學革命委員會、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第44號(1967年7月3日)，第5版。

㉔ 上柴東方紅「勇往直前」戰鬥組：〈從上柴廠文化大革命的發展看東方紅鬥爭的大方向〉，頁2；上海市無產階級革命派誓死捍衛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展覽會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從上柴問題看「聯司」和「支聯站」一小撮壞頭頭的罪行》(1967年11月)，頁3。

㉕ 參見〈從上柴「東方紅」、「聯司」的成立和發展看他們的大方向〉，《工人造反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第29期(1967年6月28日)，第1版；東方紅革命委員會「送瘟神」戰鬥組：〈上柴串聯站是甚麼樣的組織?〉，頁1。另有資料表明上柴廠的四清工作隊是1965年6月進廠的。參見上柴東方紅「勇往直前」戰鬥組：〈從上柴廠文化大革命的發展看東方紅鬥爭的大方向〉，頁2。

㉖ 李濟寰(1909-2001)，河北省定縣人。1932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唐縣縣委副書記、抗日動員委員會副主任、晉察冀三軍分區一支隊政治主任、晉察冀三地委委員、冀晉區委委員兼敵工部部長、冀晉財經辦事處主任、察哈爾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職。新中國建立後，先後擔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農機部副部長、一機部顧問、農機部顧問等。1989年9月離休。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鑒編輯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鑒2002》(總第22期)(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鑒社，2002)，頁1216。

㉗㉘㉙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頁3；3；3；13。

㉚ 上海柴油機廠「井岡山」戰鬥隊：《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個問題》(1967年2月)，頁1。該資料由李曉航先生提供，特此感謝。另有資料表明朱文斌是於1966年5月28日調往貴州柴油機廠的。參見〈關於「誰是革命組織」的調查報告(代序)〉，載上海柴油機廠紅色革命指揮部「指點江山」戰鬥組編：《工學運動萬歲！——來上柴廠革命串聯學生大字報選》(1967年3月)，頁1。這個日期也可能是指朱文斌離開上海或抵達貴州的時間。

㉛ 參見武力：〈五十年代國營企業黨政關係的演變〉，《改革》，1996年第5期，頁110-17。

㉜ 〈從上柴黑黨委看「工業七十條」流毒!〉，《聯司戰報》(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聯司戰報》編輯部)，第1期(1967年6月24日)，第1版。「工業七十條」即1961年9月16日由中共中央頒發的中國第一個《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是當時整頓工業企業、改進和加強企業管理的一個重要文件。該文件針對企業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着重對十個方面作出具體規定，其中即包括企業要建立以廠長為首的全廠統一的生產行政指揮系統及其責任制，集中領導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注釋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頁137-39。

- ②③④ 參見〈中共上海市委工業工作部 1966 年上半年幹部任免及中共華東局有關幹部、會議通知的電報〉(1966 年)，上海市檔案館，A36-1-388，頁 190、342-343、347；344。
- ③③③④⑦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 參見《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頁 4；3；4-5；6-7；8；9-10；14；9；12-13；39；1-46。
- ⑳ 革命群眾串聯總站翻印：《上海柴油機廠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二集 10 月 17 日-11 月 16 日)》(1966 年 11 月 20 日)，頁 6、8。
- ㉑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頁 3；《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頁 3-4。
- ㉒④①④② 上海柴油機廠「井岡山」戰鬥隊：《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個問題》，頁 1-2；1；1；3-4。
- ㉓ 〈從上柴黨委看「工業七十條」流毒！〉，第 1 版。
- ㉔ 上海柴油機廠獨立思考戰鬥隊編印：《獨立思考》，第一集(1967 年 1 月)，頁 3。
- ㉕ 馬天水(1912-1988)，曾用名馬登年，河北唐縣人。1931 年 12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黨前曾任國民黨唐縣第七區分部委員)，1937 年後歷任唐縣四區動員會主任、縣政府財經科長、中共冀晉區委秘書、晉察冀軍區第五軍分區政治委員、中共晉察冀第三地委書記等職。1949 年 5 月至 1967 年任中共皖南區委書記、華東局工業部部長、華東局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等。1959 至 1962 年，任上海市工業生產委員會主任。1967 至 1971 年，被結合進上海市革委會領導班子，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參見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1921-2003)》(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頁 526。
- ㉖ 〈馬天水是如何串通四級黨委破壞上柴廠的文化大革命的？〉，載上海柴油機廠東方紅革命委員會、紅衛兵「紅爛漫」戰鬥組編：《上海柴油機廠文化大革命中爭論的關鍵人物(簡論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叛徒朱文斌)》(1967 年 3 月)，頁 9；《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頁 5-6。
- ㉗ 陳明達(1915-1990)，原名元宗禹，山東萊蕪人。1938 年 3 月參加山東人民抗日游擊第四支隊，同年 7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萊蕪縣委宣傳部部長、中共新泰縣委書記、泰山地委組織部副部長等職。新中國建立後，先後任山東省委工業部副部長、山東省輕工業廳廳長等職。1961 年 8 月，任中共濟南市委書記處書記。1965 年 5 月調上海，任八機部中國拖拉機內燃機華東公司經理。參見濟南市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濟南年鑒(1993)》(山東：濟南出版社，1993)，頁 312。
- ㉘①② 〈劉東海九月二十日在全廠職工大會上的報告〉，載《革命何罪》，頁 21；19；21。
- ㉙③④⑤⑥ 〈馬天水是如何串通四級黨委破壞上柴廠的文化大革命的？〉，頁 8-9；12；12；12。
- ㉚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三冊(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頁 363-64、366。
- ㉛ 中共安徽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中共安徽黨史大事(1919-1949)》(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頁 446。
- ㉜ 中共石家莊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石家莊歷史大辭典 1921-1949》(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7)，頁 671。
- ㉝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 346。
- ㉞④⑤⑥⑦ 〈向毛主席請罪，向上柴廠革命職工請罪——馬天水同志對上柴廠革命職工、革命幹部的檢查〉，載《革命何罪》，頁 28；23、28；23；26。
- ㉟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上柴廠口〔此處被人為塗黑，無法辨認〕造反大隊、上海柴油機廠東方紅戰鬥總部「七一」戰鬥組：《再撕上柴廠假造反派(串聯站)真保皇嘴臉的遮羞布》(1967 年 1 月 9 日)，頁 1；〈「紅色革命指揮部」會議記錄〉，載《革命何罪》，頁 14。
- ㊱⑧ 上海柴油機廠聯司「專壓西風」戰鬥組：《上柴中層幹部是真的帶頭起來造反嗎？》(1967 年 6 月 17 日)，頁 5；4、8。

- ②⑨ 中共淄博市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中共淄博黨史大事記（1921年7月至1949年9月）》（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頁168-69。
- ③⑩ 之所以稱其為「幕後」，自然是因為韋錫琢已不在上柴廠任職，卻還影響着廠裏的運動。不過，為甚麼他不能大大方方地公開表示反朱的立場呢？筆者推測這至少可能與他的處境有些關係。有資料顯示，四清運動時，韋錫琢被國營長春機械廠檢舉揭發了141條「罪狀」，掌握材料組大權的楊祖熙、孟慶禮為了庇護韋，私自扣壓了這些材料，並對李濟寰、許萌為首的四清工作隊封鎖消息。後來，專案組工作隊員曾四次提出要求審查韋，一旦被支持朱文斌的人得知這些情況，對韋錫琢是十分不利的。隨着運動的發展，韋被長春機械廠打倒，並定為「三反份子」，他的夫人施志清即曾囑咐一手提拔的秘書，大意是：韋在長春定了「三反份子」定就定了吧，但韋回上海後無論如何要保護好，不能給「聯司」要去。據資料表明，這個決定還是經過「東方紅」討論的。參見上柴「聯司」鬥、批小組供稿：〈在上柴廠黑黨委的黑幕後面……〉，《聯司戰報》副刊（出版日期不詳），第1版；上柴聯司「險峰」翻印：《小喇叭》（1967年7月4日第38次廣播；1967年7月6日翻印）。
- ④⑪ 張祺日記，1966年7月17日。張祺時任機電一局社教工作團團長、上海市委總工會主任，其日記中將李濟寰誤寫為「李紀環」。
- ⑤⑫ 參見李遜：〈砸「聯司」大武鬥之前——上海柴油機廠兩大派群眾組織對立的形成及社會化過程〉，《記憶》，總第62期（2010年11月15日），<http://prc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05/REMEMBRANCE-No-62-2010>，頁15。
- ⑥⑬ 「托拉斯」是英文“Trust”的音譯，指產品相同的企業或生產有密切聯繫的企業組成的聯合經營公司，是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管理企業的一種組織形式。中國在1960年代國民經濟全面調整時期，採用托拉斯的組織形式，用經濟的辦法管理企業、改革工業管理體制。上海在1964至1965年間，挑選了部分所屬企業從經營管理和組織結構上加以改革，陸續在原有的醫藥、橡膠、煙草、紡織機械等行業中試辦「托拉斯」專業公司，並對口劃歸全國性的專業公司領導，成為它們的上海分公司。1966年文革開始後，「托拉斯」的試辦工作乃中斷。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注釋集》，頁175；張忠民：《經濟歷史成長》（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頁354-55。
- ⑦⑭ 〈在上柴廠黑黨委的黑幕後面……〉，第1版。
- ⑧⑮ 所謂「鋤奸」，其實就是寫「黑名單」，類似於「特務網」，應是專門針對持不同觀點和立場的人而設的。後來上柴廠各部門、各車間都設立了「鋤奸網」，其頭頭都是廠黨委信得過的人。參見上海柴油機廠「井岡山」戰鬥隊：《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個問題》，頁3。
- ⑨⑯ 之所以改名，一說是受劉東海的壓力（參見《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頁10），一說是上柴廠黨委的建議（參見上海柴油機廠「井岡山」戰鬥隊：《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個問題》，頁3）。
- ⑩⑰ 〈從會議記錄再揭「保」字號內幕〉，載上海柴油機廠山鷹戰鬥組編印，冷鍛串聯分站翻印：《山鷹》（日期不詳），無頁碼。
- ⑪⑱ 《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頁13。據馬天水的自我「檢查」，9月上旬，馬在康平路接見陳憲珍，陳向馬反映廠黨委和一些中層幹部「壓制民主」的情況和問及朱文斌是不是叛徒，臨走時，陳提出想成立組織。馬表示「你們自己考慮」，實際上是不反對。參見〈向毛主席請罪，向上柴廠革命職工請罪〉，頁26。
- ⑫⑲ 上海柴油機廠東方紅戰鬥總部等：《八·四凱歌——上柴聯司覆滅始末》（1967年9月），頁2。
- ⑬⑳ 上海柴油機廠「井岡山」戰鬥隊：《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個問題》，頁4；《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頁14。
- ⑭㉑ 《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頁21；〈上柴串聯站是甚麼樣的組織？〉，頁4-5。
- ⑮㉒ 上柴毛澤東思想「千鈞棒」戰鬥隊翻印：《聯司代表與政法指揮部第九次座談記錄》（1967年7月19日），頁7。